

后疫情时代下的县域城镇健康传播调查 ——基于勒温行为模型

唐 华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 疫情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时起时伏, 随时可能在任何地区成规模性爆发。本研究拟借助健康传播的定义和勒温行为模型来研究疫后县域城镇的健康传播现状, 继而探究健康传播的优化路径。本文通过抽样调查四川省岳池县288位居民并运用SPSS进行分析, 探讨样本群体的“人口学特征”、“防疫知识普及度”、“防疫态度与意识”和“防疫行为遵守度”四个板块的数据, 研究后疫情背景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信息在大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涌现出哪些特点, 从而思考板块之间和板块内部的数据关系。研究发现, 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会影响个人的情感态度与信息素养, 而被调查者的信息素养和情感态度倾向会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县域城镇; 健康传播

Investigation of county-town health transmissio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 is based on the Lewin behavior model

Tang Hu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epidemic did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 but sometimes rise and fall, and may scale the outbreak in any region at any time. This study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transmission in counties and town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health transmission and Lewin behavior model after the epidemic, and then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health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through sampling survey Yuechi county 288 residents and using SPSS analysis, discusses the sample group “demography”, “epidemic prevention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ttitude and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four plat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outbreak of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to think about the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te and the plat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edia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an affect individuals' emotional attitude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while the respon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emotional attitude tendency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individual behavioral compliance.

Keywords: post-epidemic era; county and towns; health transmission

一、研究缘起

2019年底,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来势凶猛, 席卷全球。直至2022年, 即使整个社会都掀起了新冠疫苗接种的趋势, 但新型冠状病毒也依然威胁着整个社会, 这一时期被称为“后疫情时代”: 疫情没有完全

消失, 而是时起时伏, 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区小规模爆发。在后疫情时代, 县域城镇居民的行为所反映的健康传播现状, 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社会整体的健康传播现状。2019年底, 新型冠状病毒袭来后, 不积极配合防疫工作的新闻频发。而人的行为与当时所处的情景关联紧密, 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称之为“场”。在这个“场”之中, 人的行为是由个体因素(认知与情感)和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基于此, 本文以四川省岳池县为调研地点, 基于

基金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编号: cxcy2021134

作者简介: 唐华(1998—), 女, 汉族, 四川广安人, 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健康传播。

改进的勒温行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详尽分析样本群体在“防疫知识普及度”、“防疫态度与意识”和“防疫行为遵守度”三个板块的数据,同时单独将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作为独立的板块,以此来研究板块之间和板块内部的数据变化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由此发掘其对现实问题的启示、镜鉴和建设性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 后疫情时代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席卷全球。直至2022年,即使整个社会都掀起了新冠疫苗接种的趋势,也未能完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毒株。新型冠状病毒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区小规模爆发,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由此步入“后疫情时代”^[1]。

新冠病毒将会长期存在,全球社会将处于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之中。新型冠状病毒成为常客,部分国家积极应对新冠,全球经济发展遇到难关。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变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成为世界的新特征,因此当前的时代又被称为“乌卡(VUCA)时代”^[2]。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在可持续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合力之下,后疫情时代的未来,将如凤凰涅槃、焕发新生^{[3][4]}。

(二) 县域城镇

自古以来,县域就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在城乡二元中,县域范围内的建制镇被划分到了乡村一元,行政建制的县则是“城”与“乡”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割线”。相对于大中小城市,县域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相对于农村而言,县域则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县域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也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5]。

(三) 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般认为,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脏防御计划是最早的关于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6]。如今,健康传播被定义为面向广大民众传播健康信息,以改变个体知识、态度和行为为目标从而改善全社会成员健康的研究领域^[7]。新冠肺炎疫情的陌生性和早期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全社会范围恐慌和不安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和有关自身健康信息的关注度急剧上升。大多数民众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纷繁复杂、真假难辨、不同角度的信息冲击,直接导致了公众焦虑

的产生^[8],可见健康传播之于公众的重要性。

(四) 勒温行为模型

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具有空间的属性,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在一种心理场中发生的,人的行为是由场决定的。简言之,人的行为与当时所处的情景关联紧密。“情景”就是勒温所称呼的“场”。在这个“场”之中,人的行为是由个体因素(认知与情感)和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人(person)的行为(behavior)会随着环境(environment)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基于此,勒温提出了著名的行为公式: $B=f(P, E)$,表明人的行为是人(单独的和群体的人)与环境(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数据采集

(一) 样本选取

本次数据采集地点为四川省岳池县。由于外出打工人群带动家人进城,岳池县出现了乡村人口越过场镇直接向县城集中的新现象,使得岳池县农村地区人口持续外流,主城区农村人口比例持续上升^[9]。以岳池县为例对后疫情时代下县域城镇的健康传播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资料收集

本次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至6月,共计6个月。在正式的问卷调查之前,本研究预先对20位岳池县的被调查者进行问卷预调查并根据反馈修改了问卷。随后结合线上与线下,在岳池县的火车站、医院、娱乐场所、街道、广场等地方随机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88份有效问卷。

四、研究发现

(一) 防疫知识和疫情新闻的主要信息渠道: 大众传播

根据表格,被调查者关于防疫安全知识和新冠疫情新闻的信息获取渠道从前往后均依次为微博微信、电视报纸广播、工作单位。简言之,大众传播优于其他传播渠道,这也正符合信息环境的特征。

(二) 学历对被调查的信息判断产生直接影响

学历的高低会影响被调查者对网络疫情信息的判断。由表可知,“学历”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直接相信)”产生负向影响($\beta=-0.158, p<0.005$),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保持怀疑)”产生正向影响($\beta=0.202, p<0.001$),意味着“学历”均会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

(三) 知识科普程度无法左右被调查者的态度意识与行为遵守

为了考察科普知识程度的影响,本文分别对被调

查者的态度意识与行为遵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根据统计学数据分析,唯有两对题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第一是“判断发热”与“行程轨迹上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beta=0.524, p<0.05$)。第二是“易感人群”与“口罩佩戴情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beta=0.218, p<0.05$),这与常识基本一致。但根据两对相关关系的回归分析显示, $R^2=0.096$ 和 $R^2=0.093$,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很小,这表明基于“知识科普程度”观察,影响态度意识和行为遵守程度的主要因素不在本回归模型中。

(四)情感态度倾向与行为遵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数据分析显示,情感倾向呈现出“冷漠”“不关心”“无所谓”的被调查者,其在卫生防护上的注重程度及遵守程度较低。认为“新冠疫情与我无关”的心理状态对“日常生活的消毒情况”产生负向影响($\beta=0.440, p<0.005$),对“到人多的地方的聚集情况”产生正向影响($\beta=0.383, p<0.001$)。

情感倾向呈现出“伤感”“同理心”“警惕”的被调查者,其在卫生防护上的注重程度及遵守程度会更高。认为“看到有人感染新冠的新闻我会难过”的心理状态对“日常生活的消毒情况”产生正向影响($\beta=0.536, p<0.005$);认为“对岳池本地的疫情防护工作的看法”与“健康码检查情况”同样产生正向影响($\beta=0.330, p<0.005$)。

五、研究结论

(一)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影响情感态度与信息素养

根据统计数据,被调查者了解新冠新闻和防疫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调查者面对新冠疫情和相关报道的不同反应和感受。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被调查者的学历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存在显著影响,学历高的被调查者面对网络疫情信息更倾向保持怀疑的态度。简言之,影响后疫情时代县域城镇居民的情感态度与信息素养的主要因素来源于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

(二)信息素养与态度意识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

结合第一点结论与统计数据,被调查者的信息素养与情感态度将影响被调查者的行为遵守程度。学历高的被调查者呈现出更高的信息素养,同时更配合行程上报;面对新冠相关信息出现“难过”“伤感”情绪的被调查者更容易配合健康码检查和日常生活消毒,反之则更高频率地聚集于人多的地方。

六、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指向了“被调查者的信息素养和情感态度倾向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这正是唐魁玉所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给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上了宝贵的一课,用‘重构’或抗疫史的血的教

训,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10]的逻辑注脚。接下来的后疫情时代健康科普知识的传播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排除学历的因素强化县域城镇居民的信息素养?情感态度与意识如何影响了被调查者的行为遵守程度?情感态度与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后疫情时代的具体时间节点尚未确定,被调查者的态度意识与行为遵守是否会继续产生新的变化?

本文作为后疫情时代第一阶段内健康科普知识传播研究的内容,是对往后研究的一个契机、启发,但也必然会由于情境限制而存在未被顾及到的短板,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信息传播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竹立.后疫情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04):13-20.

[2]杨黎婧.从单数公共价值到复数公共价值:“乌卡”时代的治理视角转换[J].中国行政管理,2021(02):107-115.

[3]杨士龙,胡晓光,尚绪谦.综合消息:为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强大合力——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697.htm

[4]习近平: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必将如凤凰涅槃、焕发新生[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21/c_1126770302.htm

[5]杨洁.县域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EB/OL].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3-10/11/nw.D110000gmrb_20131011_3-12.htm

[6]Kreps, G. L., Bonaguro, E. W., & Query Jr, J. L. (2003).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12-20

[7]Schiavo, R. (2007). Curr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issues. *Health communication: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30-70

[8]马箫.重大传染病疫情下公众焦虑的成因及缓解对策研究——基于“非典”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传播比较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63-67+81.

[9]方怡,王琪林,杨霞.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研究——以四川省岳池县为例[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10[2021-09-0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699.n.20210830.1734.002.html>.

[10]人民网.预防新冠病毒这些个人防护措施你做对了吗?[EB/OL].<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1/0810/c14739-32187345.html>